

旧学新探

我国旧学向称浩如渊海，因此正想研究者往往望洋兴叹，已有相当研究者益神秘其说，使徘徊岸畔者不敢问津。其实海洋虽大，汽船岂不是航行自如，甚至天空中，上下前后，一片茫茫，飞机亦得航行无阻；无他，赖有指南针之发见而已。所以旧学尽管浩瀚无涯，倘也能发见与利用一种特殊的指南针，何尝不能如汽船飞机之畅游而不致迷途呢？

今日要和各位讨论的，就是关于这种特殊的指南针；有了这指南针，便不难用新的方法来探访旧学的神秘领域。“旧学新探”这个讲题，就是因此而定的。

我对于旧学研究很浅，而且是独个儿的在黑暗中摸索，走了不少的冤枉路途，毕竟因为失败过多，也就得了一点经验，同时因为没有按照国人向来所走的大路，没有拘于成见，所以自然而然的会酌采外国的方法而变通之，结果虽不敢自认为识途的老马，至少也因为迷途过多，而偶尔发见一些捷径。

我对于研究旧学的新方法：归纳其较重要者，计得六项，就是：（一）高处俯瞰，（二）细处着眼，（三）淘沙见金，（四）贯珠成串，（五）研究真相，（六）开辟新路。现在分项叙述一下：

（一）高处俯瞰 任何人到了一个新地方，最好先乘飞机，在这新地方的空中环游俯视，如此即整个城市或区域，好像一幅极大的

地图展现于眼前。在这鸟瞰的观察中，东南西北各方的特点，以及城内城外的要区，冈陵湖川的名称，都不难识其概略。着陆以后，大处既已认识，细处自不难按图索骥。这方法比诸终日在大街小巷散步，走了不少路，仍不脱一个小区域，纵使对此区域十分熟习，而于其他区域与整个地方的形势，仍茫然无知者，孰优孰劣，尽人而知。我以为研究旧学也当照此方法，对于旧学的全貌先从高处俯瞰，具体言之，就是从目录学入手，因为目录可以助人认识学术的全貌。我国旧日治学问者，也知注重目录学；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几乎支配了读书界几十年。但是我国的目录学分类粗疏，且多模糊，没有明确的界限，尚未能有充分的效用。现在世界各国对于目录学研究日精，其收效最宏者，莫如美国。民国十九年我曾赴欧美研究科学管理，在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逗留了十一日，参考过科学管理及其相关的书籍期刊九百余册。这件事乍听起来，似乎绝对不可能，可是并无半点虚饰。因为美国对于目录学研究最精，其编目方法至为周密便利；国会图书馆尤为全国之冠，所以藏书虽然多至几百万册，但是按类检查，触类旁通，不消片刻，全馆所藏虽富，居然予取予求。再显明一点说，一个已知图书分类梗概之人，就该馆所编之完备精详的各种目片：无论从类别方面，从著者方面，从书名方面，从丛书方面，或从相关的类别方面，都可检得所欲检的书名片，而书名片上对于书的内容，著者的履历等，都有扼要的叙述，因此一片，可知该书梗概和著者的身分，对于名不副实之书与同类著作中资格较逊或思想过旧之著者，便可于检阅书名片时，不待借到原书，已先淘汰。经此初步淘汰的，假定占十分之三四。其他各书于检片时，即依定式填一书号，因陈列秩序井然，运输复借机械，一刹那间便可借得。到手以后，因书末多附详细索引，先将所欲参考之问题，就索引中检查，不得则舍去，因而淘汰者假定又有十分

之一二。得之则就指定页数阅读，一来因为一书关于一特定的问题可供参考者仅一小部分，二来因为科学的文字每段起句恒为全段之主，往往仅读第一句，便知全段应否毕读，为此而经淘汰者，其分量在选定之书中，平均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必须毕读者不过百分之五，换句话说，必须毕读者，除去三次之淘汰，仅占全部百分之二三。故全部目录中，科学管理与其有关之书籍期刊虽多至九百余册，实际必须毕读之总量不过其中百分之二三，仅等于二十册上下；以十一日之全部时间阅读之，平均每日所读不过等于二册上下之分量而已。

我因此联想到我国所谓浩如渊海的书籍，倘能仿此原则处理，断不致因数量之多，而苦于不易参考与研究。当此中外新旧学术有须沟通，以资比较研究之时，我觉得我国旧日目录学之分类法，不仅有粗疏含混之嫌，且苦不能与新学术或世界共同之学术沟通，因于民国十四年间有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之创作，以美国杜威氏之十进分类法为底本，而将我国旧学书籍按照性质，分别归入其中，其为我国所独有者，则创作几个特殊符号，分别插于相当的地位。如此，则中外图书同性质者可同列一处，性质相近者，亦列于相近之处，中外学术即可借此沟通。我的第一次大规模实验，系于二十几年前将那时候全国藏书最多之东方图书馆所藏中外新旧图书，一律按该法分类编目与陈列。结果，尚能相当满意。我的第二次大规模实验，系于十六七年前独自将旧学丛书一百部所收古籍四千余种，一一按照该法分类编目，结果共分五百四十一类，较旧有分类既详细得多，且旧日四部分类法中之子部杂家及小说家和史部的杂史等，性质模糊，包罗颇广，我均按其实际内容，一一依新分类法分类。例如镜镜冷痴一书，原入子部杂家类，乍视书名实无法断其内容，及读其内容，始知为清初醉心西学者所著关于物理学之书，我把他

归入新分类法的物理学类，性质便显然。又如见物系明代李苏所著关于动物学之书，钮匪石遗文系清代钮树玉所著关于版本学之书等，或从名称上不易知其内容，或因旧分类法归入于模糊影响之类目；类似之其他书籍，不胜枚举。我为这百部丛书所收四千余种书籍一一分类，费了一年的业余工夫。在我开始工作之时，曾和商务印书馆的前辈张菊生先生谈及，他认为这是一种勇敢的举动，而不敢必其有成，及至全部工作完成，持以就正于张先生，他也承认新分类法确能支配旧学的一切书籍。后来我把这一百部丛书汇刊为丛书集成初编，计分四千册；另附目录一册，将其中所收之书籍四千余种一一列入其所属的新类目。

现在读丛书集成之人，有了这本目录，可以一览而知这四千多种书籍的真性质，丝毫不费工夫。所以个人虽费了一些心思，创作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于前，更费了许多工夫，把这四千多种书籍一一分类于后；然因此而能节省无量数读书人的时间，那是十分值得的。

以上是关于目录学中分类的效用。除了适当的分类以外，还要靠着书籍的提要。我国旧日关于提要之书，自宋代郡斋读书志等以迄清代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其间大约一千年间的公私著作有关书籍提要者，不下数百种。我曾把这些提要分别剪贴或抄录于卡片上，按书名依四角号码排比，使同一书之各种提要归于一处，可借互相比较而订正补充，于目录学之研究极有裨益。本想把这几十万张的书籍提要卡片，加以整理排印，成为我国旧学书籍的一部大辞书，后来因丁福保先生也有同样的工作，也是汇集各种提要，编成一部四部总录，已经自行排版三千余页，尚有二三千页未排，结果丁先生把未完的工作交给商务印书馆继续排完出版。他那部书的正文排比仍按四部分类，惟书末则拟按书名编成四角号码详细索引，后来

知道我对于丛书集成按新法分类成功，还想在书末增一新分类法索引，如此则正文虽按旧分类法，但从索引上无论按书名或按新分类都可以检得各该书的各家提要总录，这的确是对于研究国学极有用之工具书，可惜目前还没有全部排成，而上海租界已沦入敌手，商务印书馆设在上海租界的工作场所备受敌人蹂躏，究竟所排书版及原稿能否幸存，尚不可知；至何时可以出版，更不能预定了。

各位试想，一方面有了沟通中外学术的新分类法，他方面又有汇集千年来各书各家提要的大辞书，事前对于新分类法略加研究，知道学术的领域如何广大，与其境界如何；临时应用，能从大图书馆中得读各原书，固然最好，否则先就图书提要大辞典中略得各该书的梗概，也就不致茫无所知。目前此项汇集各家的提要虽尚未能出版，然公私各家关于图书提要之作，皆可暂供参考，尤其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因较后出，所收旧籍也较富，虽其中任意取舍者颇多，然足供参考的价值仍不少。商务印书馆所印该书的版本，末附四角号码书名索引，检查上也较便利；而且该书较易得，各图书馆想皆藏有，在这后方书荒的时候，似可备一般研究国学者之用。独惜四库未收之书与纂修四库全书以后刊行各书，均无法就此检查，则不能不令人渴望丁先生的四部总录早日出世了。

（二）细处着眼 研究国学，一方面固须从大处入手，他方面还须在细处着眼；否则所得者仅为国学的轮廓，而不能获得精微的学识。细处着眼的方法，莫如编制和利用书籍索引。外国出版有关科学或其他学术之书，书末无不附有详尽之索引。按着这些索引去参考，可不致有所遗漏；按着许多相关的书籍的索引去研究一个专题，也可收综合之效。至于节省时间，像上文所说我在美国国会图书馆读书的故事，犹其余事。我国图书，除新近出版的书籍间有索引外，所有旧日刊行的书籍皆无索引。近十几年来，对于旧日刊行的工具

书和国学书籍增刊索引的，商务印书馆倡之于前，燕京大学引得社及其他出版家继之于后。商务印书馆所编的索引均按四角号码检字法，其已编印此等索引的大部书有辞源，中国人地名大辞典，四库总目提要，及十通、佩文韵府等。其他出版家所编之索引亦多按四角检字法，其已编印出版规模较大之作有开明书店之二十五史人名索引等。燕京大学引得社则采用洪业氏之检字法，编印索引之种类颇多，但皆与原书脱离，不若商务印书馆之附于原书之后可以立时检阅所拟参考之资料。然无论如何，既有索引，则全书内容一览无遗，便利研究，实非浅鲜。我希望今后一方面由出版家努力提倡，把新版重版各书凡有编制索引之必要者，尽量编制，附于书末；同时读书研究之人，于原书未备索引，而认为有摘记其内容之必要者，与其摘录原文，多费工夫，不如利用一种小卡片，将足备将来参考之资料各定一标题，书于片上，附注书名及页数，作为活叶的索引。其有为一种标题所未能包括者，不妨分定二三标题，各别制一索引片，随读随编，既省抄录全段文字之劳，而遇有需要之时，便可按索引片分检各原书。日积月累，所读之书愈多，所得之资料愈富，而各项资料之索引，按照字体或笔画排列，一旦有所应用，则过去若干年读书所得之资料均荟萃于一处，比诸专靠记忆，易致模糊，或临时检书，茫无头绪者，其功效不是大有增进吗？

（三）淘沙见金 我国古籍多非有系统的著作。除经史两部之大部分及子部一部分之性质尚分明外，他如子部中之杂家小说家类，与集部中之别集类，内容复杂细碎，殆无所不包，如欲就其中选取需要之参考资料，殆如淘沙见金。且不仅一书之内容如此，即一部丛书所收之各书除专科丛书外，性质亦相去甚远。欲就其中选读所当读之书，亦须经过同样的淘金手续。关于后者，我编印丛书集成就以此为主要目的，而谋有助于读书界。按我国丛书之名，始于唐

代陆天随的笠泽丛书；但这不过是个人的笔记，其自序称为丛脞细碎之书，虽有丛书之名，实在并不是丛书。自从宋嘉泰间俞鼎孙的儒学警悟和宋咸淳间左禹锡百川学海先后刊行，才开始有现代意义的丛书，但还不用丛书的名称。明代著名的丛书，如古今说海，今献汇言，百陵学山，古今逸史，子汇，两京遗编，夷门广牍，秘册汇函，纪录汇编，稗海、稗乘，宝颜堂秘笈等，也都没有用丛书的名称。直至明程荣辑刊的汉魏丛书出世，才开始有了名实兼备的丛书。降及清代，丛书之刻愈多。精者如黄氏的士礼居，孙氏的岱南阁，皆仿刻宋元旧槧；博者如鲍氏之知不足斋，伍氏之粤雅堂，子目逾百，卷数及千；其泛滥群流者，如张氏之学津讨原，吴氏之艺海珠尘等；其雠校最精者，如卢氏之抱经堂，胡氏之琳琅秘室等；其书求罕见今古俱备者，如蒋氏之别下斋，钱氏之指海等，皆蔚为大观。至于官刻丛书，则武英殿聚珍版实为巨擘；郡邑丛书，则明代之盐邑志林开其先路，清代之泾川岭南金华畿辅等继之而起。又专科丛书之最古者，当推南宋何去非校刊之武经七书，盖为一部纯粹的军学丛书。他如医学丛书则有元杜思敬辑刊之济生拔萃，明王肯堂辑之古今医统正脉全书等；经学丛书，则有清钱氏之经苑，阮氏之皇清经解，钟氏之古经解汇函等；文字学丛书则有明郎奎金之五雅全书，清钟氏之小学汇函，张氏之许学汇函等；史学丛书则有清广雅书局之史学丛书，清胡氏之向影楼輿地丛书等；艺术丛书则有明沈津辑刊之欣赏编等；目录学丛书则有清张氏之八史经籍志等。迄于今日，就顾朱傅罗诸氏的丛书目录与杨李二氏的丛书举要所著录者，总计部数多至三千余；然大多数名实不符，删改琐杂尤甚；其有相当价值者至多不过三四百部。六七年前我从这几千部丛书中，选取其内容丰富，而合于实用或罕见两种标准之一者，凡一百部，编为丛书集成初编。此百部之丛书，以各类具备为原则，别为普通

丛书专科丛书地方丛书三类：普通丛书中，宋代占二部，明代二十一部，清代五十七部；专科丛书中，经学文学史地目录学医学艺术军事学合十三部；地方丛书中，省区郡邑各二部。表面上在三千余部之丛书中，仅占微小之部分，实际上对于三千余部丛书所收之书籍，殆占其三四分之一；则以各丛书内容，除芜杂不足取或毫无价值者外，彼此重见实居多数。即如丛书集成初编之百部丛书，本来括有六千余种之书籍，然去其重见者，仅存四千一百余种，可知重见之数至少占三分之一；其他丛书自亦相同，且或更甚。而且汰除重复后之四千一百余种中，至少还有一部分没有多大的参考价值，由此推算，三四千部之丛书淘汰为三四百部，此三四百部丛书因容有许多规模较小之丛书在内，其分量约等于丛书集成所选百部之倍数，换言之，即括有书籍约一万二千种。按丛书集成之重见程度推算，此一万二千种书籍，汰其重复，至多尚有八千种；而此八千种中无多大价值者，假定占四分之一再加淘汰，所余仅六千种；又此六千种书范围至广，以一专家就一专题研究参考，至多能利用其十分之一，即六百种。这便是淘沙见金之一例。又上文已经说过，子部中之杂家及小说家类，与集部中之别集类，因内容复杂细碎，如以专家就一专题研究参考，实无自头至尾毕读之必要，如能一一编为详细之索引，便可节省许多时间，对于非必需之部分可略而不读；假定略去之部分占原书三分之二，则上文所说能利用之书籍六百种，经此淘汰，实际当读之分量仅等于二百种，这又是淘沙见金之一例。

（四）贯珠成串 我国古籍的内容，既如上述，大多数复杂细碎，欲就其中搜罗一系的资料，自非采取贯珠成串的方法不可。换句话说，仿佛按上述淘沙见金的方法，将淘得的金沙，变为有眼的珠子，而把一条线将他们贯串起来。我的朋友许地山先生，在他去世以前，费了两三年工夫，从一百多种的笔记中，搜罗关于扶箕的

资料，著有一部扶箕迷信的研究，把这些丰富的资料归纳起来，加以论断；这正是贯珠成串的最好例子。本来前人尚无关于扶箕的专著，要搜罗有关扶箕的资料，只有就许多的来源，就是一百多种的笔记中去探检；由此种探检而得的资料固如珠子之可贵，但是没有一条线，还不是像一堆散沙无法贯串起来？这一条线就是归纳和论断的工作，其价值实不下于这许多的珠子。我近年也曾做过一种类似的工作。就是从四百多种的清人文集，搜罗关于考据之文，计得一千三百多篇；再把他们分类归纳，就各家之说互为比较，假以时日，再加论断，本可成为一部考据的考据，即不然，至少也可成为一部考据汇编。现在这些资料都留在香港，沦于敌手，实在可惜。总之，我国无量数的文集笔记之中，所含的宝贵资料实甚丰富，只以散漫无条理，不下一番工夫，将无从发见；但如肯下工夫，又能利用适当的方法，则任何小题目都不难成一有根据的巨著，而如扶箕这样一个小题目，许先生竟写成将及十万言的一部书，而且处处都有根据，非言之无物者可比。由此推想，则对于任何其他题目，都可获得同样的结果。至应行利用的方法，第一步当如我所说的居高俯瞰，从目录学中认定可供取材的门类和书类；第二步当如我所说的细处着眼，利用已有的索引或自己随时编制的索引，不要放过了细微的资料；第三步则实施贯珠成串的手段。

（五）研究真相 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的确是关于研究上一句最古的名言。因为著书的人，一来为见闻所限，不免有遗漏或错误，二来因不免带些主观，论断上未必充分公允，所以专靠一部书所说，无论关于何种史实，都未可遽信为十分正确；欲免此弊，最好是从各方面的记述来作比较。以历史的记载而论，读了正史还须旁参稗史野史和各种私家著述，以资证明。我以为一部历史大半是许多重要人物所造成，这些重要人物自己的记述，当然

最可靠；就是和这些重要人物接近的人所记述，毕竟见闻较切，也较公家的一般记述，或私人借转辗传闻而记述，自然可靠得多，即或未必更可靠，至少也可利用以为旁证。我国对于这些重要人物事迹的记述，大都包括在各种年谱之中：由本人自己记述的，称为自撰年谱，即等于现代所谓自传；由他人记述的，就是一般的年谱。这些年谱，不仅按年记述谱主的事迹，而且把和谱主有关系的人，或其同时的主要人物的事迹，甚且同时发生的重大事件，都附带记述，比诸西洋式的传记，对于参考史实的价值尤多。我近年为复兴中的东方图书馆搜罗了年谱一千二百余种，在全国公私所藏中，算得最完备。我常常把这些年谱所记的史实，和正史稗史等所记比较一下，觉得有很多的出入；因此，拟了一个计划，想把这些年谱汇集刊行，而另编一部详尽的索引。把这许多年谱所记的重要史事，和重要人物的事迹，一一分别标题，自索引检得标题，即可就各谱分别参考。然后把各谱间所记述的异同，与正史稗史等所记者互相比，或从多数为断，或从记述时之情形为断，一方面固可纠正正史等记述之错误，他方面亦可证明正史等记述之正确。我深信这于研究历史者，实有重大的补助。可惜港沪沦陷以后，所藏年谱是否安全尚不可知，而个人转徙频繁，不遑宁处，一时实亦无从促成此举。但我很劝研究历史者，能多读有关人物的年谱，以资比较，实甚有益；即以最近之史实而论，本来去今未远，故老相传，耳闻目击，都可为证，然个中人或与其接近者之记述，毕竟更为透彻。我觉得近人梁燕荪的年谱，于民国初年之政治内幕及洪宪帝制之经过，其记述大可供研究者之参考；又近人徐雨之之愚斋自叙年谱，于清末公营实业及一般工商实况，参考资料亦甚可贵。近人之年谱尚有如许可供参考之价值，则去今甚远之年谱，足为公私史籍之旁证，更为显明。

(六) 开辟新路 研究学问的人，应如探险者一般，不当死守着一条老路，必须时时开辟新路，才有发见或是获得捷径的希望。试举检查字书一事为例。按说文部首检查，久已不适于用；按康熙字典部首检查，既不正确，又甚迟缓；按声韵检查，非人人所能，即能之亦甚迟缓；按笔画检查，固甚易学，却因同笔字数过多，检查之迟缓为一切方法之最。因此对于检查字书辞书常苦困难，而编制大规模之索引，更有所不能，以致治学工具不能充分利用，更不能积极扩充。此为治学之障碍，许多人知之，然知之却仍拘于习惯，不得不仍用旧法。我在十几年前费了几年工夫，开辟一条关于检查字书辞书所编制索引的新路，就是发明了四角号码检字法。在初时颇有些人反对，但十几年来，至少已有五百万人利用此法检查字书辞书和索引，而感觉其易学速检。最近五六年来，我又作了一件类此之事，就是在助人速检楷体文字的四角号码检字法之外，又发见和开辟了另一条新路，使对于甲骨金石大小篆等字体向视为神秘而不敢问津者，现在可于经过一星期的训练后，对这些古体字没有一个不认识了。我本来对于古体字不很认识，但近年来却发了一个宏愿，或者说是起了一个奢望，就是想以一个不很认识古体字之人使人人都能认识古体字，经过了五六年的业余工作，在我去年十一月离开香港之日，已经把刚刚完成的一部千页以上的古体字典影印清样，无意中带到这里，而且无意中从敌人魔掌中救了出来。我的方法大致是将甲骨文大篆古文奇字和小篆缪篆等所有字体一一附注释文，按照我最近发明的另一种检查方法，使费了几日工夫学会这方法的人，都能够一检而得其字，同时借释文而认识其为何字。这方法虽也应用号码，却和四角号码完全不同；因为四角号码适用于方形而常具四角的楷书，古体字的形体特殊复杂，与楷书大不相同，自须另采一种方法。但因字体复杂之故，这方法之要想满意的适用，

我的确费了不少工夫，易稿至十几次，并将六七万个古体字，一一实验满意，然后按照此法编排为字典。去年十一月全部一千余页均经影成清样，假使不因香港战事发生，该书早已出版，使一般见了古体字而不认识者借此认识其为何字。可惜原稿和已制之版全部毁损，虽手边尚有清样一分，可作原稿之副本，但按照内地的印刷条件一时实无法重新印行。上述的两个例子，其目的在说明研究旧学不可墨守旧法，必须随时按需要开辟新路。

以上六种方法，仅是方法之一部分；我相信还有许多的方法是我没有想到的，而且我所想到的实也不限于此六种，不过举此六种，以示梗概。触类旁通，实有望于一般富有前进思想而研究旧学的青年。

（民国三十六年六月为中央大学讲）